



“十二五” 高等院校文科类专业规划教材

中国历代

文学简史

上

史言喜 梁文娟 主编

中燕古今如
但有舊歡新
後夜景為余
共聽穿林打
嘴且徐行行
馬誰怕一蓑
行峭春風吹
斜照卻相
蕭瑟震歸去
無晴定風波
外載詞選
琴於金

“十二五”高等院校文科类专业规划教材

中国历代文学简史

(上)

史言喜 梁文娟 主编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郑州 ·

内 容 提 要

《中国历代文学简史》是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配套使用的教材,本书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两宋辽金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及近代文学九部分,共分上下两册,上册始于先秦止于魏晋南北朝,下册始于隋唐五代止于近代。

《中国历代文学简史》适合作为语文教育、初等教育、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的基础教材,也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文学简史/史言喜,梁文娟主编.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
“十二五”高等院校文科类专业规划教材
ISBN 978-7-5349-6535-7

I. ①中… II. ①史… ②梁…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0803 号

出版发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编:450002

电话:(0371)65737028 65788110

网址:www.hnstp.cn

策划编辑:崔军英

责任编辑:孟凡晓

责任校对:李振方

封面设计:宋贺峰

责任印制:张 巍

印 刷:河南省罗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85 mm×260 mm 印张:30 字数:74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0.00 元(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国历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成长,艺术地再现了先民的生活图景,承载着无数先贤的智慧、精神、理想、人格、骨气、希冀、志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千百年来,它陶冶人们的情操,鼓舞人们的志气,启发人们的思想,抚慰人们的灵魂,铸造人们的人格,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书是《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的配套教材,内容编写上注重思想性、科学性、全面性、实用性,简要勾勒出中国历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与轨迹。本书共上下两册,按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辽金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及近代文学分编,力求全面反映历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作家整体的思想倾向,以及文学作品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风貌。

本书在体例上延袭传统断代体例,以宏观扫描为基础,在具体章节中进行系统的微观审视。每编之始专论各代文学的风貌,分述各种文学兴起、演变、承继之轨迹;在微观审视中对重要作家专章介绍,对主要作家归章立节,对一般作家简明介绍。在章节之下设立醒目标题提纲挈领地对作家风格特色进行总括,章后以思考题形式将该章重点列出。本书注重吸收、消化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内容简明扼要、点面结合、科学实用,可以活跃学生和读者的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是高职高专类中文教育专业的适用教材。

本教材编写分工如下:先秦部分由史言喜编写;秦汉部分由刘义钦编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由李乃岭编写;隋唐五代部分由梁文娟编写;宋辽金、近代部分由高卫红、罗静编写;元代部分由刘筠编写;明清部分由王原璞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征博引,吸收和借鉴了许多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自筹划始,历时两年,其中甘苦自不待言,即将付梓,编者感慨万千,深为这套文学简史的出版欣慰,同时又心怀忐忑,因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甚至谬误之处,请专家、同仁及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年10月

《中国历代文学简史》

编写人员名单

主 编 史言喜 梁文娟
副主编 刘义钦 高卫红 刘 筠 王原璞
李乃岭 罗 静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原璞 史言喜 刘 筠 刘义钦
李乃岭 罗 静 高卫红 梁文娟

目 录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绪论	(2)
第一章 原始诗歌与神话	(8)
第一节 伴随劳动而生的原始诗歌	(8)
第二节 蛮荒时代的观察、体悟与幻想——神话	(10)
第二章 《诗经》	(14)
第一节 《诗经》概说	(14)
第二节 《诗经》的思想内容	(15)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	(21)
第四节 《诗经》的地位和影响	(23)
第三章 先秦历史散文	(26)
第一节 历史散文滥觞	(26)
第二节 可当小说读的历史书——《左传》	(28)
第三节 政论记言之书——《国语》	(31)
第四节 纵横捭阖的时代人物志——《战国策》	(32)
第四章 诸子散文	(35)
第一节 诸子散文的产生和发展	(35)
第二节 先哲横空出世——《论语》和《墨子》	(36)
第三节 入世之书——《孟子》	(39)
第四节 出世之论——《老子》和《庄子》	(41)
第五节 法家先导与集大成者——《荀子》和《韩非子》	(44)
第五章 屈原和楚辞	(49)
第一节 楚辞的产生及其文化背景	(49)
第二节 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其《离骚》	(51)

第三节 《九歌》《九章》及其他作品	(55)
第四节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59)
第五节 宋玉及其作品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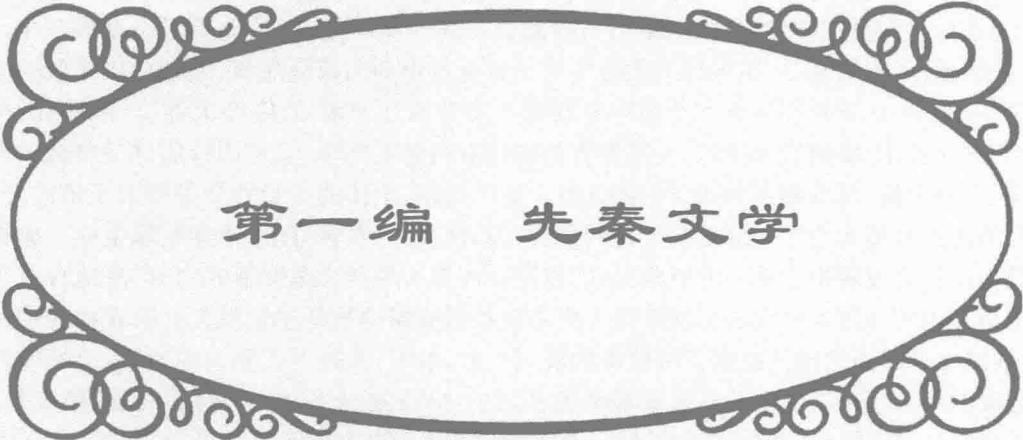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绪论	(64)
第一章 秦汉散文	(68)
第一节 《吕氏春秋》与《谏逐客书》	(68)
第二节 指点江山的文字——汉代政论散文	(69)
第三节 刘向和两汉的记事散文	(73)
第四节 情真意切的书信——汉代抒情议理散文	(75)
第二章 司马迁和《史记》	(78)
第一节 博学多识而命运多舛的史学家——司马迁	(78)
第二节 《史记》的思想价值	(81)
第三节 《史记》的艺术成就	(83)
第四节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88)
第五节 班固与《汉书》	(89)
第三章 汉代辞赋	(92)
第一节 赋的起源和特点	(92)
第二节 西汉辞赋作家	(94)
第三节 东汉的辞赋创作	(100)
第四章 两汉诗歌	(107)
第一节 两汉乐府民歌	(107)
第二节 《孔雀东南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112)
第三节 文人五言诗和《古诗十九首》	(115)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122)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诗歌	(125)
第一节 建安风骨	(125)
第二节 从正始之音到永嘉诗坛	(133)

第三节	南北朝民歌·····	(141)
第四节	南北朝诗人·····	(145)
第二章	田园诗的开创者——陶渊明·····	(156)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历程·····	(156)
第二节	陶渊明诗歌的田园意趣和咏史抒怀·····	(158)
第三节	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	(162)
第四节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63)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散文·····	(165)
第一节	建安与魏晋时期散文·····	(165)
第二节	南北朝散文·····	(169)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辞赋·····	(174)
第一节	建安与魏晋时期辞赋·····	(174)
第二节	南北朝辞赋·····	(176)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180)
第一节	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	(180)
第二节	志怪小说·····	(181)
第三节	志人小说·····	(185)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	(189)
第一节	曹丕的《典论·论文》与陆机的《文赋》·····	(189)
第二节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191)
第三节	钟嵘的《诗品》与萧统的《文选》·····	(193)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绪 论

先秦即先于秦或秦之先,指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天下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春秋末战国时代)三种社会形态。先秦文学是指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

我国的原始社会大体经历了原始群和原始氏族公社两个历史时期。中华大地上很早就有了古代类人猿活动的痕迹,从八百万年前的云南腊玛古猿化石到三百万年前的湖北古猿牙齿化石,再到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都是中华大地上类人猿向人类进化的遗迹。而自一百七十万年前云南元谋人始,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松散社会组织——原始群出现了,此后直到夏王朝建立,中国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一百多万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先祖完成了直立行走和向智人过渡,逐渐形成无数的原始群落。约二十八万年前到五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遗址有辽宁营口、陕西大荔、广东曲江、山西阳高、湖北长阳、山西襄汾等地,晚期智人的遗迹有内蒙古乌审、北京周口店、广西柳江、台湾台南、吉林榆树、江苏泗洪和四川资阳等地。这一时期,个体的力量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依靠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抵御野兽的侵扰,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才能勉强生存。血缘家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种家庭形式,也是我国第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广泛地存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古老民族的早期阶段。采集植物和捕捞动物是原始猿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在高山和河泽之间活跃的各种兽类如虎、豹、熊、狼等,既是古代猿人的威胁,也是他们追杀猎取的对象。古人的生活是极其艰辛的,生产力的极端低下,科学文化知识的极度贫乏,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外部环境的凶险,使人类的祖先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可是,猿人以极其艰苦的劳动,顺应了自然,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自己,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原始文化,使人类得以繁衍,社会得以发展。《韩非子·五蠹》中“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易传·系辞下》中“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神农氏,都是创始神话中的神人,是史前人类生活方式的象征。他们大多带有旧石器时代原始群落生活的影子。

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在大约距今一万年前,以磨制石器、陶器和农业的出现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家畜逐渐发展为畜牧业,母系氏族公社逐渐确定。原始群时盛行的血亲婚配逐渐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开始形成族外婚制,即一个氏族的一群青年男子集体“出嫁”到另一个氏族中,与一群青年女子结为夫妻。在这种婚姻形态下,由于男女双方关系不固定,子女只能确认生母而不能确认生父,氏族成员只能按母系的血统来算,一个母系氏族公社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在氏族内部有着明确的分工,青壮男子担负狩猎、捕鱼和防御猛兽的任务,而采集食物、烧烤食物、缝制衣服、养老育幼等,则由妇女担当。妇女在确定血缘关系、维系氏族生存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由此决定了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尊崇地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典型代表,粟是仰韶文化先民最早栽培成功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仰韶文化先民所种植的主要农作物,而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嫦娥可能就是母系氏族公社的首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母系氏族公社

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社会创造了黄河流域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浙江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诗经·大雅·生民》中说,周人的先祖是姜嫄脚踏神仙的脚印而孕育后稷,后稷教民稼穡,实际上反映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和农业的兴起。中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不少关于父系氏族制度流行时期一些著名氏族和部落的传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关炎帝、黄帝等部落活动的传说。通过这些传说可以看出,约在四千年前,中国境内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散居着许多氏族和部落。这些氏族和部落经过长期的战争和交往、迁徙和联盟,逐渐形成一个以共同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族,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和前身。传说中所谓的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正是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反映。炎帝和黄帝是同时代传说中的人物,也是一个部落或部落集团的首领。炎帝姓姜,是炎帝部族的首领。他们自西方游牧进入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长期发生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今河北省),得到黄帝族援助,攻杀蚩尤。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打败了炎帝族,由西北进入了中原地区。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又与居住在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势力较强,文化成就也较高,因而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此,人们往往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史书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时代,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概貌,“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推举部落联盟酋长的情形。事实上与“五帝”并存的部落还有很多,黄帝取代神农氏,战胜炎帝和蚩尤,以及尧、舜、禹之时与共工、三苗的关系等,都反映出部落之间征战频繁的状况。

公元前 21 世纪左右,禹在帝舜时期接任其父鲧的职位,治理天下水害有功,被帝舜选拔为继承人,禹继舜帝位后废除“禅让制”,传位给其子启,开创了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夏朝末年,夏王桀不务修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商部落日益强大,成汤起兵灭夏。夏朝从禹至桀,共经历十七王,约四百七十年。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区,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当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大玉刀纹饰精美,堪称绝品;酒器铜爵体型轻薄,纹饰简单;嵌绿松石的饕餮文铜牌制作精巧,别具匠心,标志着夏朝文明已经步入青铜器时代。公元前 16 世纪到公元前 11 世纪的殷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重要阶段。商原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夏朝末年发展到黄河中游,征服许多部落之后,灭夏而建立商朝。从成汤建国到纣王灭国,共历经十七代三十一王,约有五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商人“不常厥邑”,从成汤到盘庚,曾五次迁都。盘庚迁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朝亦称为殷或殷商。殷商时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大量制作和使用青铜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青铜文化,《尚书·多士》中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册用于教育,出现了面向贵族子弟传授祭典、礼乐、军事和伦理等内容的教育机制。殷人特别崇敬鬼神,重视占卜,将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便是甲骨卜辞。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为研究殷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出现也为书面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甲骨卜辞就是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前 771 年的西周以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巩固为主要特色,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221 年的东周以奴隶制宗法制度的逐渐破坏为主要特色。西周定都于镐京,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东

周迁都于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地理方位相对而为西东。周代保留下来的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文物比殷商时代更多,社会状况也更为清楚。公元前841年,西周厉王因暴虐无道,被流放于彘,史称“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为大宗主,所封的诸侯为小宗主;诸侯国内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国君与卿大夫相对而为大小宗主。大小宗主层层区别,形成树形结构。诸侯的领地称为“国”,大夫的领地称为“家”。天下耕地实行井田制,以量功计禄,不得随意开垦荒地以增加耕地。西周用礼乐制维系统治秩序,严格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礼”用以区别不同的等级,“乐”用以调节和谐的情感,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从周武王到周幽王,西周共经历十二王(厉王后共和行政十四年),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的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量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周王室统治日趋衰微,诸侯兼并,霸主迭起,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春秋早期南方的楚国率先僭号称王,后来吴国和越国也先后称王。周定王十三年(前594),鲁国实行按耕地的数量征税的“初税亩”,以取代实行力役之征的井田制,表明私田得到官方的认可,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重要标志。孔子首开私学之风,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强烈地冲击了世袭制度。旧制度逐渐被破坏,新制度逐渐形成,公元前481年齐国大夫田常杀死国君齐简公姜,取得齐国大权,公元前40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世卿所灭,公元前475年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终至于赧王五十九年(前256)为秦昭襄王所灭。诸侯各国先后实行政治改革或发生政变,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据《战国策》记载,当时的强国纷纷称王,有“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右,历经二百五十多年的纵横捭阖,东西征战,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分裂局面。

如上文所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深植在先祖们生活的蛮荒时代,那是一片浩渺无际的浑茫云天,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识,也不能明晰起源的具体年代。原始社会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应该只是对先民们那段美丽梦幻时代的追忆。先秦文学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却有内涵丰富、形式精致的文学作品,它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精神特征,并在观念和形式上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传统。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文化大致同步,与音乐、舞蹈、绘画和造型艺术等彼此关联,互相影响。我国文学的起源需上溯到史前史(没有成文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阶段)的口头文学,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例如夏代有一首著名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表达了人民对夏桀暴虐统治的愤慨,以及要和他同归于尽的斗争决心。原始歌谣是最早的文学样式,是原始社会先民在劳动和祭祀等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先民在石器时代形成了自然神信仰,氏族社会形成了祖先神的观念。他们在祭祀、大战前后、大猎、大耕种、大收成之际,必有歌舞,而与之相伴的颂美、祈祷的韵语,便是原始歌谣的一种形态。同时,先民把自然力神化,并企图借助想象解释它、征服它、支配它,从而产生了神话。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

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列子》《淮南子》等古籍中,其中以《山海经》最具有神话学研究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英雄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原始文学突出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有少数以社会矛盾为表现主题的,可能产生在原始社会后期。原始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的特点,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修改、删削和曲解,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口头相传的形式。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书面文学的源头是甲骨文,而且有较为明显的两条分支:甲骨卜辞中的韵文逐渐发展成为诗歌,而非韵文则慢慢演变成历史散文。

诗歌的起源与巫术宗教相关,在形式上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古代的人相信韵语能够传达一种神奇的法力,从而通过神灵达成人们的愿望。商代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简单的韵文,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而《周易》卦爻辞中则保存了很多的谣谚,如《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是光明入于地下,喻光明被阻的时候;“垂其翼”谓君子像低垂着翅膀的鸟儿,退避隐藏,在昏暗中流落远方,但君子若在此时行动,必然要受到当政者的责备。这则爻辞语句整齐,并且运用了比兴手法,有人认为这些歌谣是《诗经》的源泉。

《诗经》共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唯一的诗歌总集。《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中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会风貌,感情真挚,风格淳朴,手法多样,语言优美且生动精致、凝练整饬,体现了非常高超的艺术水平。《诗经》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为我国诗歌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情感特征、抒情方式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史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国晚期,有明显巫术宗教色彩的楚文化培养了楚国文学艺术的浪漫精神,楚辞就是这一文化背景的产物。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在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和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诗经》之后约三百年的时间,散文勃兴而诗坛消沉,屈原和楚辞的出现打破诗坛的消沉,突破《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将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屈原既是中国诗歌由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人雄伟的诗篇,两千多年来一直放射着无穷的光辉,“沾溉后人,非一代也”。楚辞在情感表达上委婉深致、缠绵悱恻、富有激情,而在表现方法上却多用神奇的想象和比喻,语言华丽、优美,显示出浪漫诡谲的风格特征。楚辞和《诗经》并为中国诗歌的两个源头,他们共同哺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

历史散文的发轫也是龟甲卜辞。殷商时期,文字日趋成熟,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由各处出土的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周易》卦爻辞及《尚书》，可以看出我国散文由句而章、由章而篇及先记事后说理的发展过程。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初步确立时期。此时，历史散文的创作很发达，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这些史著不仅总结了国家成败之理，也对散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意义。《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简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记载编撰而成，文字简练似流水账簿，未能构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义，一字之中暗寓褒贬、别善恶，遣词严谨的“春秋笔法”，文字表达技巧高，表现能力强，标志着散文语言日臻成熟。《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左传》《国语》有了具体的情节、逼真的对话和人物的音容笑貌，到了《战国策》则更多地以夸张的笔法、巧妙的情节，描写了人物的神态和个性。它们开创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史笔传统，为后世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丰富的题材。

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统称为诸子。诸子为谋求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种种治国方略，游说辩论，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百家争鸣促使诸子散文蓬勃兴盛，主要有战国初期的《老子》《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战国末期的《荀子》和《韩非子》等。就学术派别而言，《论语》《孟子》《荀子》属于儒家，《墨子》属于墨家，《老子》《庄子》属于道家，《韩非子》属于法家。就文章体例而言，《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孟子》和《庄子》属于论辩文，但《孟子》尚未脱尽语录体，《庄子》已接近专题论文。《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是以题概篇的专题论文。先秦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内容，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然而这些著述的议论说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畅，宏丽恣肆，想象奇特，辞采华茂，甚至还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寓言特色尤为明显，先秦诸子既大量运用民间寓言，也自行创作寓言，内容丰富，故事生动，手法多种多样，充满智慧和风趣，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胚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大放异彩。《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散文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而这都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其一是开创性。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二是综合性。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内容。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

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对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为了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标识音乐的末章,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其三是目的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目的性,或因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其四是自由性。自由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做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做坦率的表白。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征圣宗经”。东周时代诸侯异政,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创始性、综合性、目的性、自由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中国文学自其发生始,在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准备阶段,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先导,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文学著作,体现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都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并在内容、体制、风格等方面形成一种规范,被后人认为是学习的楷模。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木之本水之源,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又是一杆标尺,它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模式,因而受到极高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引导、校正着后世文学的发展方向,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一章 原始诗歌与神话

本章主要介绍原始口头文学的起源,原始诗歌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的特点,中国古代神话的产生、类型、主要神话作品及蕴含的民族精神本质。具体评析了《盘古开天辟地》《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作品,并简单介绍了神话的流传与演化。

远古蛮荒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先民们面对强大而神秘的大自然弱小无助,他们渴求以艰辛的劳动取得生存的机会,既要与毒蛇和各种猛兽搏斗,又对自己的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满了恐惧,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现象甚至火都无法解释,于是对自然充满迷茫和畏惧,原始诗歌与神话就这样产生了。

第一节 伴随劳动而生的原始诗歌

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原始诗歌,它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了,当时还没有文字,原始诗歌是人们口耳相传的口头创作。

一、文学艺术的起源

关于文学起源的问题,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以下几种:①模仿说。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认为诗歌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而模仿的本能植根于人的天性之中。②神示说。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把诗歌的产生解释为神的灵感在诗人身上的凭附,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很流行。③宗教说。该说认为文学源于宗教,宗教活动的内容形式直接导致了文学的产生,早期的文学与宗教密不可分。④游戏说。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德国哲学家康德和席勒,席勒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束缚,渴望运用过剩的精力去追求自由,这就是游戏;而艺术活动,即在游戏中导源。⑤劳动说。俄国普列汉诺夫在《原始民族的艺术》中阐述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原始民族的艺术》是对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核心观点的推广和演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在苏联和中国的文艺理论界盛行。此外,关于文学起源,欧美学术界还有心灵表现说、巫术说、冲动说、性爱说等。中国古代学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得出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结论,中国古籍也记述了几种艺术起源的观点。《吕氏春秋·古乐》认为原始的乐歌是“效八风之音”“听凤凰之鸣”而产生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艺术起源于模仿的观点。《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这与西方的“表现说”相似。

凡此种种观点,除劳动说之外,大多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或以人的先天禀赋作为立足点来解释的,因而都没有能对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直到人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分析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才对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获得了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的科

学认识,即: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从宏观上讲无疑是正确的,但应防止其简单化和绝对化,说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生活应该更合理一些。

鲁迅先生也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在其《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依据如下:首先,从哲学理论上讲,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创造了文学艺术,人类在劳动中锻炼了自己的双手和大脑,为文学艺术的产生创造了物质的生理基础,同时,人类的劳动生活也为文学艺术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对象,所以,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了文学艺术。其次,从文学艺术本身来看,诗歌的韵律、音乐舞蹈的节拍,均起源于劳动节奏。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多是笨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在集体劳动中,为了谐调动作,提高效率,减轻疲劳,便自然而然地依照着劳动动作发出一种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从而形成一定的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诗歌韵律的起源。

《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当然,仅仅只是简单的劳动呼声,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但它是诗歌赖以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当这种劳动呼声被语言所代替,或与一定的语词相结合时,语言便有了它的歌唱形式,呼声也有了确切的含义,于是,一种具有节奏性、音乐性的语言艺术——诗歌,也就正式产生了。

《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大禹治水,遇涂山氏之女,彼此相爱,但不久禹又到南方巡视水情去了。涂山氏之女使婢女在涂山之阳等禹,许久不见禹,她便唱曰:“候人兮猗!”这首歌被称为《候人歌》,歌虽短,却表达了“等人”的内容和她的感叹,这大概是我们能了解到的最早的一首诗歌作品了。《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北音之始为帝喾时代的有娥氏二女所作“燕燕往飞!”怀念飞去不返的燕子,四个字表达了失落惆怅之感。

另外,原始社会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多与生产劳动有关。原始时代的歌谣,保存下来的很少,且古书中的一些所谓尧舜时代的歌谣又多不可信(如《击壤歌》《南风歌》)。但也有些古籍中偶尔保存下来一些质朴的歌谣,从其思想和形式看,比较接近原始形态。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东汉赵晔著)中所载的一首《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

歌谣由四个双音节动宾词组构成,句短音促,质朴无华。砍断竹竿,弯连成弓,弹出土石,逐击禽兽。这首猎歌,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从制造工具到捕猎野兽的整个劳动过程,简短、淳朴、自然、流畅。语句中流露出人们的自豪感和欢快的情绪。

又如《易经》中《归妹》卦载: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这是一首牧歌,在牧场上,男男女女在剪羊毛时,一边劳动一边互相嬉笑着对唱出来的。诗歌有情有景,形象生动有趣,洋溢着一种欢快之情。

在《礼记·郊特牲》中,还记载着相传为伊耆氏时代的《蜡辞》,故被称作《伊耆氏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这是一首祭祀百神、祈祷来年农业丰收的祭辞。伊耆氏一说是神农,一说是帝尧。